

●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URBAN DESIGN SERIES

城市公园反思

——公共空间与文化差异

Rethinking Urban Parks
Public Spac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美] 塞萨·洛 达纳·塔普林 苏珊·舍尔德 著
魏泽崧 汪 霞 李红昌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城市公园反思

——公共空间与文化差异

塞萨·洛

[美] 达纳·塔普林 著

苏珊·舍尔德

魏泽崧 汪霞 李红昌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54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公园反思——公共空间与文化差异 / (美) 洛 (Low, S.), (美) 塔普林 (Taplin, D.), (美) 舍尔德 (Scheld, S.) 著; 魏泽崧, 汪霞, 李红昌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ISBN 978-7-112-14310-8

I. ①城… II. ①洛…②塔…③舍…④魏…⑤汪…⑥李… III. ①城市公园—园林设计 IV. ①TU9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8284 号

Rethinking Urban Parks: Public Space and Cultural Diversity/Setha Low, Dana Taplin, Suzanne Scheld

Copyright © 2005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Nanning, Guangxi, P.R.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广西万达版权代理中心代理,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正式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董苏华 李 东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陈晶晶 刘 钰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城市公园反思

——公共空间与文化差异

塞萨·洛

[美] 达纳·塔普林 著

苏珊·舍尔德

魏泽崧 汪 霞 李红昌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 字数: 268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一版 201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ISBN 978-7-112-14310-8

(2237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术语的诠释

在对原稿的首次修改过程中我们试着调整涉及描写人群的种族划分、种族和阶级时惯用的术语。我们清醒看到这些类别是在社会中创立起来的——这是构想的、创造的、商谈的和习惯使用的——这是通过人们关于特别的地点、时间和环境使所有的分类都成为固定化并且表达精练，使不稳定的和持续的转变社会认同。我们也关注种族关系是怎样通过种族和阶级划分的观念变成历史性的观点，而种族分类是如何被证明在活动中是习惯性差别对待。尽管如此，我们的主题仍然是文化多样性，并且形成了我们的许多观点——我们相信会被允许——我们需要从文化角度和与政治有关的群体来写，而不是写个人，使用受访者和社区同事们能够理解并能用于代表他们自己的术语。

同样有问题的是每个章节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刻的研究，人口研究〔从说西班牙语的人（Hispanic）到拉美裔人（Latino），从黑人到非洲裔美国人〕和学术中的人种/民族术语〔从黑人到非洲-加勒比裔美国人（Afro-Caribbean American）或非洲裔美国人〕都会改变。我们也有关于未标注的“白人”种族的问题，公园研究中频繁使用，而只有标注的社会“其他”种族被讨论。在纽约和美国东北地区，“白人”包含许多不同的人种和文化群体，他们之间在历史，阶级地位，语言和居住方面的术语很少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最近到达的俄罗斯人，他们对雅各布·里斯公园的使用在社会和文化上不同于长期使用的布鲁克林居民，不同主要体现于对海滩的使用和兴趣上。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发现独立公园的第四代意大利裔美国人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不去看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原因是与他们的文化团体有关，在这点上超越了我们采访的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提供任何固定的术语或类别，涉及或识别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不同文化、人种、种族或阶级团体。相反，我们依靠团体自身使用的分类，或项目开始时公园工作人员和管理者给我们的他们使用的分类。因此，每一章的术语都是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个人使用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术语和被委托管理的特别公园项目的分类不同，那么同一章内的术语也会不同。读者应该不会对这些不同感到困惑，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使用黑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人还是波多黎各裔人，白人或犹太人的抉择。

我们希望读者能考虑到这种变化的术语的丰富性，作为创造性的，身份认同和个人确认的一部分，同时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反映了黑人/白人，白人/有色人种，本土居民/移民的散布在我们语言中的区别和二元性，并能引起美国社会的区分。尽管我们没有直接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以及我们在城市公园和海滩中描述的在文化进程和排外形式下的种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我们想让这项工作的核心是反民族主义，并促进对民族主义如何作为一种种族优势/劣势的系统的更好理解，并改变公园每天的使用和管理。

致 谢

作者在此感谢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特别是国家独立公园的 Doris Fanelli 和 Martha Aikens，埃利斯岛的 Richard Wells，雅各布·里斯公园的 William Garrett，已故的 Muriel Crespi 博士，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的前任负责人，Rebecca Joseph 博士、Chuck Smythe 博士，东部沿海地区快速人种志项目的负责人，对这些课题的支持。我们还应该感谢管理纽约公园和娱乐场所的管理部门以及佩勒姆湾公园的负责人，凡科特兰和景观公园的 Linda Dockery，对纽约市研究报告的财政支持的 Mary Ann Anderson 和 Tupper Thomas。

塞萨·洛（Setha Low）还要感谢洛杉矶盖蒂中心的盖蒂保护研究所（GCI）全体员工，Sheri Saperstein，Valerie Greathouse，David Myers，Kris Kelly，Eric Bruehl——为这本书所作的努力。从 2003 年的 1 月到 3 月，在 GCI 的学者奖学金的支持下使他一路走来顺利地完稿。我们还要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特别是人类环境中心以及其管理者，Susan Saegert 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 Susan 的支持和她的员工的帮助，这个研究项目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本书使用了以下文献的材料：

- Low, Setha. 2004. Social Sustainability: People, History, Values. In *Managing Change: Sustainable Approaches to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ed. J. Teutonico. Los Angel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 Low, Setha. 2002. Anthropological-Ethnographic Methods for the Assessment of Cultural Values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Assessing the Values of Cultural Heritage*, ed. Marta de la Torre, 31–50. Los Angel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 Low, Setha M., Dana Taplin, Suzanne Scheld, and Tracy Fisher. 2001. Recapturing Erased Histories: Ethnicity, Design,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

- Case Study of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18 (2): 131–148.
- Taplin, Dana H., Suzanne Scheld, and Setha Low. 2002. Rapid Ethnographic Assessment in Urban Parks: A Case Study of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Human Organization* 61 (1): 80–93.
- Taplin, Dana H. 2003. Sustainability in Urban Parks—Narrow and Broad. *Proceedings: Urban Ecology: Citie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Pace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and Regional Studies, 65–76.

写一本书常常需要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为这个项目收集资料的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被计入长长的名单里，包括 Charles Price-Reavis, Bea Vidacs, Marilyn Diggs-Thompson, Ana Aparicio, Raymond Codrington, Carlotta Pasquali, Carmen Vidal 和 Nancy Schwartz。我们决定不将凡科特兰湖项目的负责人 Kate Brower 写入本书中，但是她的深刻见解和指导仍然使我们受益匪浅。Larissa Honey 和 Tracy Fisher 在项目进行前同样参与了研究工作，她们的工作对于我们完成项目也是非常重要的。来自 Matthew Cooper、已故的 Robert Hanna 和盖蒂保护研究新的研讨会成员，尤其是 Randy Mason 和 Marta de la Torre，他们的意见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我们同样要感谢 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 Benita Howell, William Kornblum, Galen Cranz 和 Randy Hester，感谢他们对此地的研究和他们的一些著作以及他们的有益的评论。

我们同样感谢国家公园管理处人类学研究项目的领导人 Muriel Crespi 博士和喜爱这些公园的景观建筑师 Robert Hanna 对这份重要工作的支持。Miki 和 Bob 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去世，所以他们不会看到他们努力的最后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保留他们对文化活力支持和公园保护的愿景。

我们衷心感谢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总编辑 Theresa May，手稿编辑人 Lynne Chapman 和设计师 Lisa Tremaine。在纽约市立大学方面，我们要感谢 C.H.E. 的 Jared Becker。

最后，我们将这本献给我们各自的伙伴——Joel Lefkowitz, Michele Greenberg 和 Isma Diaw——感谢他们研究和记录过程的热情和支持。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从出借汽车和拍照到做晚饭——因此这本书得以完成。谢谢所有为我们的工作作出贡献的人们。

目 录

术语的论释	iv
致谢	vi
第一章 大城市空间的文化生活	1
第二章 城市公园——历史和社会背景	15
第三章 普罗斯佩克特公园——危险中的多样性	27
第四章 埃利斯岛大桥提议——文化价值，公共场地使用和经济	51
第五章 雅各布·里斯公园——历史景观的利用之争	73
第六章 佩勒姆湾公园的奥查德海滩——公园和象征意义文化的表达	91
第七章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重新体验抹去的历史	107
第八章 评估文化价值的人类学方法	125
第九章 结论——文化与差异的论断	137
参考文献	149
译后记	156

引言

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开始发现为什么一些纽约的城市公共空间那么成功，比起其他的那些空旷、冷清和无用的公共空间，那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经过7年的时间对城市广场和小公园的拍摄，他发现在纽约只有很少的一些广场可以吸引市民，并且通过拍摄他看到这种衰落对城市文明所造成的威胁。他开始倡导在城市中建立能供人们见面、放松和交往的场所。他在对那些环境受欢迎、有活力的广场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现在著名的“小城市空间规则”理论。而这些规则被纽约规划部门运用到了城市公共空间改造中。

在新世纪，我们正在面对各种对公共空间的威胁——没有一个公共场所是废弃的，但是其设计和管理的模式却让一些人排斥，并且减少了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可以减少不喜欢它的人的数量。在其他方面，设计和规划也是私有化、商品化、具有历史保护意义和明确战略意义的一个副产品。然而，这些措施可以减少空间或空间整治后的生机和活力，用这样的方法只能使一种人——通常是旅行者或者是中产阶级的参观者——喜爱那种感觉。其后果之一是，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数量在逐步减少，同时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私有化、门控、围栏、关闭整修和重新设计约束了正常的活动。在拉丁美洲以及美国这些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些能让人们见面和参与公共活动的空间在急剧减少（Low 2000）。

这些变化对于其他社会活动也存在着潜在的危害，它取决于公共空间和有活力的公共领域中多种分类和多种文化的交流。至少在9·11事件之后是这样的情况，在所有的公共空间中只有极少数地方仍旧保留了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但是华盛顿广场和联邦广场仍然如此。自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们进一步增加了防御措施来保障安全，用实体的屏障、私人的保镖以及警方来保护先前的开放公共空间和建筑。这种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

同样来也来自美国人对世贸双塔被破坏后的过度反应，他们隔绝自己，否认团结、开放和乐观的情绪。

对于“异类”的安全感和恐惧感

在世贸大厦被毁坏之前，对于安全问题的关注一直都是信息化美国城市的一个摆设，他们只强调封闭的围栏，警方的保护以及私人的空间。尽管许多美国人把他们的目光放到了弥漫在城市中令他们感到害怕的犯罪和暴力事件上，但是通过整个社会阶层，这种反社会的通常被叫做对“异类”的恐惧情绪已经成为从郊区发展以来隔离居住区和工作场所的标志。人们开始向郊区迁移来躲避市中心的肮脏、疾病和大量的移民者，就像车子一样频繁来回。但是从郊区到城市不仅仅是物理的距离——一个更强大的社会距离产生了，并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种族偏见和阶级偏见被维持着。

但即使在城市，类似这样形式的社会距离已初具规模。比如在今天，富裕的纽约人能满足他们对居住在不同社区或合租公寓里的安全性的要求。其他城市居民依赖邻里监视系统忍受着不断增长的居住行为的约束。面对逐渐下降的犯罪率，城市恐惧的结束证明了对城市空间更为严格的管制是十分合理的。

越来越多的新式检测技术证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感加深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新的电子监控技术正在美国各地实施。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美国人似乎不太可能会同意把他们的生活暴露在监控摄像机或者警方监视下。但是现在一些市民要求把监控摄像机安装在像弗吉尼亚海关这样的地方用以人脸的扫描，并在计算机犯罪分子信息数据库中进行核对检查。棕榈泉（Palm Springs）在主要的商业街道上的棕榈树上均安装了电子眼。一度被认为是龙头产业和侵犯公民自由的技术现在被广泛地用在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上，几乎不用对其结果进行任何检验。在危急关头提高安全性时，我们所支付的费用不是增加的警务人员的薪水或者是引进视网膜扫描技术的花费，而是在失去了自由的行动和公共空间文化多样性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特征。

全球化和日益多样化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两个补偿过程正在进行。大批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教育正从发展中国家向较发达的地区迁移，同时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越来越频繁。之所以宏观环境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是因为第一，移民流动的速度增长；第二，当地人口的增长率之差；第三，美国整体“褐色”现象。当地的环境质量正逐步改善，本国的和同种移民的领地在城市中扩张，封闭式小区在城市郊区和边缘发展。在文化和种族分化的这个历史时期，关于这些改变的对话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该如何在这种新的政治气氛下继续整合我们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提升社会忍耐力呢？我们认为，方法之一是确保我们的城市公园，海滩，文化遗址——那些能令我们走到一起的大规模的城市空间——维持它们的公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一个能让所有人放松、学习、休闲的开放场所，以至于让我们能有一个安全又公开的地方进行人际交往或是团体合作及解决矛盾。

1990年，塞萨·洛（Setha Low，美国人类学协会前会长），在达纳·塔普林（Dana

Taplin) 和苏珊·舍尔德 (Suzanne Scheld) 的帮助下, 在人类环境中心的研究生院和纽约大学中心的城市大学创立了公共空间研究组 (PSRG), 来进行这些问题的研究。PSRG 把研究人员、社会成员和公务员召集到了一个整合调研、理论和政策的论坛。这个组织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人、社会、政治和经济实力与公共空间关系的理论框架。PSRG 把目光放在了关于空间分隔的社会发展进程、路径冲突和空间控制、人与空间联系的价值与意义这三个方面上。

在我们对大城市公园和文化遗址的文化功能进行了解的 15 年时间里, 已经注意到全球化对当地的影响: 更多的移民, 更大的差异, 公园空间功能的更新, 经营和维护所需的公共资金的减少, 更多私人实体管理职责的交流。我们也目睹了这些改变所产生的影响, 如通过历史保护和加强控制而出现的公共空间通过监督进行物质重建。我们已经记录下了对当地文化的误解是如何逐步上升为威胁周边社区的社会问题的, 而这个问题同时也引发了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小城市空间的同样的过程。在某些方面移民也是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但在 9·11 之后已经变成令人恐惧的“异类”。对大型公园限制性的管理给移民者、当地居民以及多元化的行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 用于社会活动的最后剩下的空间也会消失, 而这些地方是各种不同性别、不同阶级、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和和平交流的场所。

4

管理和提升社会与文化多样性的论断

基于我们的观察, 城市公园、海滩、文物古迹可能会受到同一化的力量。我们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研究项目以确定什么样的活动和管理方法能促进、支持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这些项目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断, 它与威廉·H·怀特的小城市空间社交的提升规则有些相似,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这些论断可以提升和 / 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每一个论断都来源于一个或者多个公园人种志研究方法。在下面的一个章节将会阐明。

这些论断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它仅仅为公园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所涉及的对文化敏感度的选择提供一个框架和引导。其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1. 如果国家历史博物馆和纪念馆不能代表人民, 或者更严重一些, 他们的历史被抹去, 那么他们将不再使用这个公园。

2. 路径是和经济学以及公园作为流通和运输用途的文化模式相同; 因此, 当为全社会的群体提供路径时, 必须考虑收益和访问模式。

3. 不同团体的社会作用能够被保持并加强, 通过在全部场所的大型空间中为每个人提供安全的空间充足的领地。

4. 调节社会阶级和种族团体使用和评价公共场所的不同方式, 对于维持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所必须作出的决定是必不可少的。

5. 当代历史保护不应该专注于恢复景观特征也不应该恢复设施和吸引人们到公园的娱乐活动。

6. 交流文化意义的象征性方式是地方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可以着重发展以提高文化的多样性。

5

这些论断对在城市公园和文化遗址中维护和提升文化的多样性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多的研究和实验将被用来充分了解其重要性和解决维持公共空间活力的难题。但最起码，这些论断说明了什么样的多样性可以成为评估人类生态系统成功的重要部分。本章其余部分讨论了这个理论和支持我们立场的实际根据。我们不能断言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就是决定着大城市位置的因素，这个论证也需要被当前的社会理论和实践来证实。考虑到其多样性，里面包含了经济和道德的因素，这对于任何一个城市空间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章节提出的基础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对大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在将来是如此重要。

理论框架

社会的可持续性

什么是“社会的可持续性”呢？依据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1995）的观点，可持续性是指一种现象的演变发展和其品质的持久性，避免短期或临时的解决方法，并关注自我实现和自我持续的系统。对支持和维护“自然平衡”的生态系统和对支持和维护文化生活和人类文明的“文化生态系统”给予同样的关注（Throsby 1999a, 1999b）。可持续发展是通过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达到对环境的维护和美化，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对艺术、社会态度、习俗和信仰的保护。

社会可持续性文化可持续性的一个子集：它包括了对增强文化系统的社会关系和意义的维持和保护。社会的可持续性特别强调了维护和提高当代群体的不同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关系。但是，要真正理解社会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在思罗斯比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三个要点。

1. 地方保护

文化生态系统处于时间和空间中——对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的维持或是保护，它所存在的地方是应该被保护的（Proshansky, Fabian, Kaminoff 1983; Low 1987）。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性需要对其存在的地方进行保护。相当明显的一点是，当处理物质环境和问题时对于文化的再现是至关重要的。

2. 文化生态理论

人类学家之所以运用各种理论是为了使文化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特定的地点发挥作用。举个例子，贝内特（Bennett 1968；又见 Netting 1993）通过模拟自然系统的生态动力学来了解农民的社会政治立场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变化。科恩（Cohen）（1968）在发展中地区制订了一个文化发展计划，来预测居住模式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虽然许多文化生态学理论已经遭受了历史的批评，尽管如此，文化生态系统模型中的动力系统及预测系统两个方面对特定地区的社会变革的研究仍很有用处（Barlett and Chase 2004）。

该例子位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San José），这个城市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心广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直到1992年，中心广场仍存在着一个完善的、空间组织性强的文化生态系统，而这个系统由东北角的擦鞋者（图1.1），西南角的退休的老年人（图1.2），西北角的销售商和宗教工作者（图1.3）和中间内圈的妓女和体力劳动者组成。这个已经建立的文化生态系统在1993年被破坏，当广场被政府关闭，历史空间被重建，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对旅行者和中产



图 1.1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中心广场的擦鞋人



图 1.2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中心广场的老人们



图 1.3 中心广场的销售商和宗教工作者



图 1.4 重建后的中心广场

阶级具有吸引力 (Low, 2000)。

但是, 重新设计破坏了社会的生态平衡。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一群年轻人, 接管了这个公共空间, 却带来了一个不安全、不受欢迎的环境。那些不如哥斯达黎加人的尼加拉瓜人成为了周末公共空间的主要的使用者。这个例子说明了目前文化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及其不同的场所); 社会空间场所 (地域) 被破坏以后, 系统比起以前的干预, 现在更不能有效地维持自己。该地区的重建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它的环境, 实际上, 如果该地区的社会生态被忽视, 那么可能将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和障碍。

3. 文化的多样性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文化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对作为遗传基因库和适合生命进化的物质环境至关重要, 而在文化的多样性中也有其社会副本。文化多样性虽然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关键词, 但他还没有在规划和设计中进行实践, 更不用说它的可持续发展了。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当其作为一个概念性的目标提出时, 产生了一个关于它的研究内容的小争论。但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提升文化和社会持续性的方法, 其为一个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地方人类群体延续的明显的结果。

这种修正的文化生态系统或多样化模式为社会可持续性的定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基础。但社会可持续性所包含的内容要比文化生态系统和多样化体系的内容多。它暗示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立场去维持社会文化系统, 并在任何情况下延续和支持它们。而在这个意义上, 有些问题一定会被问到: 如社会的可持续性对所有人都适用吗? 我们已经假设人类生态系统不会相互竞争, 即便其可以这么做。一个成功的文化系统能够超越其他的任何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的自然选择以及建立在进化论和生物社会学模式之上的最佳生存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可持续性吗? 又或者是我们应该从强者那边来保护的弱势群体、系统和城市场所吗? 这些道德和政治问题是要在应用和实践中的被解决的。

最后, 当我们讨论社会可持续性时, 我们需要在各种不同的范围内提出议题, 如局部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局部地区的社会可持续性已被早先的例子所阐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

地方的文化活力可以通过其公园以及公园附近和遗产遗迹的历史价值来维持。在区域范围内,社会可持续性通过一个广泛的计划支持被更好的概念化,它不仅来自个人的支持,还有近邻、社会、组织、教会和社团的支持,以及存在的文化价值和贯穿整个历史的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的支持。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的《地区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1995; 又见 Hayden 1990)展现了一个少数人记录和纪念文化历史和女人成为社会主体的社会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社会的可持续性更接近戴维·思罗斯比的“可持续发展”,它建立在联系、文化、平等以及对环境公正评价的基础之上。

因此,社会的可持续性是指成功地维持现有的文化生态系统和文化的多样性。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含义相互包含而并非独立的时候,社会的可持续性是被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可持续性通过了解历史、价值、文化表现和任何不同的文化环境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培养。事实上,当地的居民,他们的历史及他们的价值观,最终加强了任何一个公园的长远的社会可持续性。

文化产权

在重视文化产权(Cultural Property Rights)的道德规范方面,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论证被提了出来。在一个基本水平上,道德规范是对个人居住生活的一种正确的考虑方法,尤其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面(Lefkowitz 2003)。但是,当道德规范在做正确的事时,它不会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意指相同的事物。广泛地说,他们会对你的行为负责而且会避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但是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形中才能发挥作用。

克里斯·约翰斯顿(Chris Johnston)和克里斯塔尔·巴克利(Kristal Buckley)(2001),在遗产保护实践中讨论文化内容的重要性时指出,道德规范将文化价值转化成了行动。这种转化最容易在跨文化或多元文化的情况下见到。约翰斯顿和巴克利提供了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考古协会通过制定了一系列道德规范的管理原则,引导澳大利亚土著和海峡岛民成为其成员。“除此之外,这份文件承认了本土居民对文化遗产和重要遗迹的第一所有权”(2001, 89)。正因如此,澳大利亚考古协会制定的本土的文化产权的道德关系,将会为本土居民和他们的文化遗产的适当行为设定界限。

文化产权的争论核心是谁拥有着历史及谁有权利或责任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关于过去的哲学问题上……他们同时把价值的多样性和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这各种不同团体的利害冲突的争论放在了前沿”(Warren 1989, 5)。凯琳·沃伦(Karen Warren)(1989)提出,对出现的各种争论最终都可理解归纳为“3R's”: 1)对民族起源文化资产的归还(restitution); 2)对文化资产“进出口”的限制(restriction); 3)各方权利的保留(retention)。

在每一个议题里,许多争论已经得到证实,为什么传统的或是本土文化产权不受到重视?举个例子,当文化资产遭到破坏时,沃伦(1989)利用“救援措施”来抵抗文化起源国家要求对文化资产的索赔。如果那些文化起源国家没有能力去“拯救”他们的文化资产,那么就on让像沃伦这样有能力的外国人来保护它们吧。那些拯救了文化遗产的人认为,现在需要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赔偿。其他属于“学术访问争论”的论点也沿用了这些路线——如果文化物质

回归到本国或是文化的起源地，学者将没有适当的途径来有效地保护它们。所有的“外国所有权论点”和“人类所有权论点”的争论已被全部用来讨论国家文化的起源。为解决这些反对的观点，沃伦提出，如果作为一个目标来强调保护并且让妥协与共识相结合，这样就能解决文化资产的问题。他的解决方式的重点就是站在基本的道德立场上，承认涉及任何一个文化遗产解决办法的价值和观点多样化的重要性。

像史密森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联合国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也在这些道德规范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论证。伊万·卡普（Ivan Karp）（1992）指出，“由于博物馆承认了对社区的责任，这样一个尖锐的道德难题就被提了出来”（11）。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一个社区在出现以下这些问题的時候就会提出要求：受到伤害，被其他的社区限制，共享的资源被用完。博物馆一定会决定谁来为社区辩护和这样的索赔是否对不同群体同样有效。在物质文物被遣送回来的情况下，当地和国家的社区以及文化团体对博物馆如何决定和引导他们这件事十分感兴趣。

11 为了公平的审理文化资产的索赔，所有社区和文化团体都必须参与讨论之中。我们争论的是一个能让他们继续见面和思考问题的地方。遗产遗址和城市公园是最开始讨论的两个公共空间的例子。从道义上来说，有时有些文化产权的“文化”和“环境”部分正在被其他人使用和控制，这种情况是建立在权力得到公平的分配，所有的文化团体享有继承的权利并拥有自己家园的基础上的。同样的理由可以被用来强调维持公园、海滩和遗产遗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社区参与，授权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文化产权的提出不是唯一思考这些道德问题的办法。温迪·萨尔基西安（Wendy Sarkissian）和唐纳德·佩尔古特（Donald Perlgut）（1986）提出在正使用的公园和文化遗址中寻求社区参与的两个理由：1）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它是有伦理道德的，人的生命和环境受到影响后应该对其进行商议；2）为了得到应有的参与权利，人们会积极支持计划和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来维持公园可能会使开销增加，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很少有政府可以支付用于抵御外部控制的费用。然而，协同合作的优势还没有被完全了解。即使是经常使用公园，对公园资源有充分了解的社会成员，也往往不被包括在计划和维护项目之中。这可能是部分公园管理者对居民和使用者的能力的一个错误估计，也是因为公园管理者缺少员工、表达方式和合作培训才没有办法配合当地的社会团体进行有效的工作（Borrini-Feyerabend 1997）。

对于社区参与和权利的讨论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城市变得越来越种族多元化和在人口统计上更种族分化的情况一样（Gantt 1993）。过去的公园为白人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邻近的地区提供了一个相对均衡的服务，现在，公园必须提供娱乐场所、教育场所和执行社会计划，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和多类人群。由于当地政府没有能力为所有的居民提供适当的服务，市长和市议会成员，以及公园管理者和规划者对出现的问题很难进行解决，如公园资源的枯竭，邻里关系的恶化。我们已经从逐渐减少的市政资金的历史中了解到，当远远达不到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需求时，公园和遗产遗址使用政府资金的权利就被放到了后面。

在城市中增加文化的多样性是否可以被用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的这个问题出现了 (Gantt 1993)。我们认为它可以通过当地的授权组织,在本地和国家的公园范围内来表达他们对其历史的要求。通过授权协会来要求把公园的资源归于自己名下并参与决策——其决策的过程包括,对公园的维护和规划分配资金和劳动力。公园的管理者与合作者联手,可以使公园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较好的维护状态。然而,城市管理者 and 公园规划者知道了更多关于邻里社区、文化群体以及他们的价值在改变过程中的不同需求,从而使文化群体的需要与可利用的资源更加准确匹配。

一些城市项目使用公众参与和授权策略来建立本地文化资源和公园办事处。例如,华盛顿、西雅图的“查尔斯顿原则”,它规定任何意见的更改包括对社会文化的规划过程,都要涉及广泛的社会成员——公共机构、公民和社会团体,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商业和经济利益,艺术家、团体领袖和文化组织这样所有的类型。因此,公众权力是任何规划和设计过程具有合法指令的一部分(金县地标和遗产项目, 1999)。

另一个例子是“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已经着手为社会在遗产项目中的积极参与制作了一本相关手册 (Johnston and Clarke 2001)。运用相同的伦理道德和实际的观点。作者认为社区参与是否是民主参与的一部分,取决于一个项目是通过民选政府管理还是社区自己指挥运行。通过社区参与,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1) 了解社会期望和价值观; 2) 发现社会的需要; 3) 了解当地和社区; 4) 分享观点; 5) 发现相同点与不同点; 6) 吸取更广泛的想法,最终创造出新的解决办法 (2001, 3)。约翰斯顿和克拉克的报告提供了一个与人和文化群体交流方法的清单,它是任何社区参与项目开始的极好指导。

其他的合作项目强调当地社区经常被公园规划,政府管理部门和当地政策所忽视。芭芭拉·哈里森 (Barbara Harrison) (2001) 总结了与当地群众和研究者在北美、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一起工作的经验,对她在研究和应用实践中引导协同合作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

公民的观念以及拥有的权利,成为了提出这些方案的基础。公民的自由概念定义了作为个人在民族国家里所拥有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但是这个定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公民必须被充分考虑为是街区、地区、国家中的社区的一员和一个或者多个社会团体中的个体的一员。公民的权利应该被理解为是包括国家、地区、街区和社会不同层次的个人参与,从而产生了人与社会的多链状和多层次的社会政治关系模型 (Yuval-Davis 1998)。

公民的大部分争论都是关于在一个国家生存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一个人是否可以在此停留居住,不被遣返),工作状态,以及像选举权和社会福利这类权利与义务的问题。把这些相同的观念赋予到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上,并对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资源和服务进行参与决策。我们认为市民也应该关注个人和社会在决定他们当地开放空间和历史资源的成败上所扮演的角色。包含在社区参与和参与街区及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生活的全部公民的权利,在公园规划过程中为社区参与和授权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如果把全部的社区和文化群体都包括在内,那么我们也赋予公民领导者和参与者继续促进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权利。